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中国民族史 和 中华文化

马戎
著

HISTORY AND COMMON CULTURE
OF CHINESE N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中国民族史
和
中华共同文化

马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族史和中华共同文化/马戎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2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4015 - 6

I. ①中… II. ①马… III. ①中华民族 - 民族历史 - 文集 IV. ①K2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1698 号

·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

中国民族史和中华共同文化

著 者 / 马 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史雪莲 秦静花

责任校对 / 邓 敏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015 - 6

定 价 / 79.00 元

印 张 / 24.5

字 数 / 388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马戎

在记载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历史的文献中，曾经有许多词汇被用来表现中国人的“地域认同”和“群体认同”。在地域的概念方面我们读到的有“天下”“九州”“四海”“神州”“中国”等，在群体的概念方面我们读到的有“华夏”“诸夏”“四夷”“狄戎”“蛮夷”等，在二者之间的关联方面，我们在《左传》中又读到“中国诸华”这样的称谓，但是却从来没有看到类似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民族”这样的概念。即使在一些典籍里出现“民族”这样的词汇，如《南齐书》中的“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编屣，滥用夷礼”等句（肖子显，1972：934），所指的也只是“诸华”的民众氏族。《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对汉语“民族”一词的解说是：“汉语中‘民族’一词出现的年代较晚。在中国古籍里，经常使用‘族’这个字，也常使用民、人、种、部、类，以及民人、民种、民群、种人、部人、族类等字。但是，‘民’和‘族’组合为一个名词则是后来的事。1903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把瑞士—德国的政治理论家、法学家J. K. 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以后，民族一词便在中国普遍使用起来，其含义常与种族或国家概念相混淆，这与西欧的民族概念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民族编辑委员会，1986：302）现在绝大多数中国学者都

接受这一观点，即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民族”“民族主义”等概念，不是继承自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而是接受了近代工业化和相应民族主义运动中出现于西方国家的“民族”（nation）概念，这一词汇和相关概念仅仅是近百年来才开始在中国社会流行。

中国人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等一连串战败和割地赔款之后，被迫向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打开大门，并不得不以外来的“民族”“民族国家”概念逐步取代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和“华夏－四夷”这样的传统秩序模式。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必然面临如何以外来的“民族”“民族国家”的观念来重新理解和书写中国几千年历史的这个大难题。

在清朝末年，“民族”这个概念应当如何应用到清朝统治疆域内的民众身上？是把传统的“中华朝廷治下的臣民”统称为一个“民族”，还是把疆域内持不同语言、有不同祖先记忆的各个群体称为不同的“民族”？这是清末保皇党、君主立宪派与激进的革命党之间激烈争论的一个核心议题。而这一争论，又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些企图分化瓦解清朝的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扰。这些垂涎于中国自然资源和庞大市场的帝国主义国家，已经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建立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自然最希望中国进一步分裂为许多个“民族国家”，沦为列强的“保护国”和殖民地。所以在西方国家的外交书信、商贸文件、地理勘探、人类学考察文献中出现“藏民族”“蒙古民族”“回回民族”“满洲民族”“汉民族”等称谓，就是最自然不过的，而且这些称谓和概念也经由日文印刷物及中国留日学生的翻译进入了中国人的话语体系。正是在这些概念传播了多年的基础上，激进的革命党才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十八行省建中华”的汉人种族主义口号，中华民国初年那些力图维持国家统一的政治家们才会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口号。为了防止“汉满蒙回藏”各自的“民族主义”被列强利用而导致国家分裂，梁启超先生才提出了“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这两个概念，来对当时两个层面（中华民族、汉满蒙回藏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加以区分。孙中山先生也在《三民主义》中特别说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孙中山，1924/2000：2，5）。他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

中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民，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1981：2），明确提出要以“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单元来建立中国人的“民族国家”。

既然承认了中国存在“汉满蒙回藏”等“民族”，尽管梁启超先生认为这些是“中华民族”这个“大民族”范围内的低一个层次的“小民族”，但是这些“民族”之间毕竟在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祖先起源、社会组织、传统经济活动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公认的差异，那么，这些群体在历史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各自是如何演变的？彼此之间又是如何交往的？他们各自的祖先是否同源？他们由古及今的群体认同意识又是怎样的？换言之，这是在辛亥革命后以“中华民族”名义建立的“中华民国”是否具有历史合法性的一个关键问题。通过撰写《中国民族史》，以历史典籍为证据系统论述中华各族之间的历史联系，表明这些群体世世代代就已经是一个稳固的政治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以此作为群体认同的基础，以新的“中华民族”为认同对象，在各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呼唤“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以外来但已被普遍接受的“民族国家”概念为基础建立统一的“中国人的现代国家”，就成为辛亥革命后摆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极为严峻的任务。

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出版了多部《中国民族史》的历史社会背景。

20世纪初在中国各族知识分子中出现的关于“中华民族”“国族”概念的讨论，梁启超先生关于“大、小民族主义”的讨论，30年代出版的几部《中国民族史》，既反映出西方“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和影响，也反映了当时一些努力维护国家统一的社会精英希望从构建“民族历史”的角度来增强中国凝聚力、防止国土分裂的良苦用心。又如1939年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时由顾颉刚先生倡导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在当时伪满洲国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筹建的严峻形势下，也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时间推进到了21世纪，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面临一个新的严峻的国际环境。这是一个世界上一些霸权国家极力在政治和经济上打压中国发展空间的时代，是一些国家的右翼势力挑动领土纠纷使中国与邻国的关

系出现复杂化的时代，也是中国社会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期的时代。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因体制转型导致内部各种矛盾不断涌现；国内具有不同竞争潜力和发展条件的各民族群体之间出现了利益差异；境外反华势力正在极力利用中国各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煽动各族群的“民族主义”，从而削弱自己的“竞争敌手”。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期，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和努力加强中华各群体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我们更需要重温中华民族的民族关系史。

近几年来国内关于是否存在“普式价值”的讨论，关于传统儒家思想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跨文化对话中的角色的讨论，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在 21 世纪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战略的重大课题。今天中国的文化战略必然包含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中华民族、中国如何开展与世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之间的跨文明对话。为了使对话取得积极效果，我们需要挖掘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共性，使之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沟通 and 建立共识的基础，同时向对话的其他国家介绍中华文明的特性，争取对方的理解和尊重，从而在平等交流和善意对话中推进良性互动，逐步消除和化解彼此之间的误解和隔阂，不断消减历史（如“冷战”和边境冲突）遗留下的敌意，增强政治互信。另一个层面是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文化传统（如不同族群和不同宗教信仰群体）之间的交往与相互学习。在这一层面也需要重温中华各群体几千年的交往历程，重新挖掘各族交融共享的价值观和文化元素，明确共性、尊重特性，坚持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在互相学习，吸收彼此长处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中华民族的现代文化，加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格局，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团结、自信、繁荣和富有创新精神的现代公民国家。

当年的“中华民族”概念和“中国民族史”的撰写与构建是在 20 世纪初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历史时刻提出并加以讨论的。今天我们思考应当如何设计和实施中华民族的文化战略，也是在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美国“重返”亚洲并导致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出现新动态的严峻历史时刻所必须面对和研究的问题。

这本文集名为《中国民族史和中华共同文化》，收入了我近些年发表的一些文章，其中8篇与中国民族关系史这个主题相关。《读王桐龄〈中国民族史〉》《中国传统“族群观”与先秦文献“族”字使用浅析》和《“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与“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这三篇文章，直接涉及中国民族史的内容。《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精英：理解中国从“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进程的钥匙》《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这两篇文章，主要涉及中华民国时期关于“民族”概念和民族认同问题的讨论。《现代国家观念的出现和国家形态的演进》《在革命背景下俄国和中国的“民族构建”路径》这两篇文章，讨论的是近代沙皇俄国和清朝在西方列强冲击下开展“现代民族构建”进程的路径比较。《中国的民族问题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主要讨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的历史背景和今天我们对于这项工作的反思。

另外几篇文章则与今天我们应当如何构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这个主题相关，特别是《如何思考21世纪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和《加紧创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应对21世纪面临的严峻挑战》这两篇文章，集中讨论的是今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思路。《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与“黄帝崇拜”的族群狭隘性》这篇文章，讨论的是改革开放后一些政府文化部门对“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概念的宣传在我国少数民族中的一些反响。《中国“族群”概念的探讨》一文是给关凯《族群政治》写的序，由于讨论涉及有关“民族”“族群”的基本概念问题，所以也收在本书里。后面的三篇主要讨论我国少数民族面对的“双语教育”的问题。在21世纪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构建中，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语言和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何从“多元一体”文化语言格局的角度来认识族际公共语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工具作用，同时重视各民族语言和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这是需要主流社会和少数民族精英共同来讨论并实施的中华文化建设中的大问题。

在这本文集中还收入了有关西藏发展和当代中国民族政策方针的两篇文章，并在“附录”部分收入了几篇对谈。这些文章和访谈都与中国民族史和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创建这个主题相关。希望这本文集中的这些文章能

够引起大家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视，同时也希望大家共同来关心中国在 21 世纪如何制定自己的文化发展战略这个大问题，使中华民族在积极开展对外跨文明对话的同时，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内部的文化凝聚力。也许正是这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构成支撑 21 世纪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国家软实力。

参考书目

孙中山，1924，《三民主义》，长沙：岳麓书社 2000 版。

孙中山，1981，《孙中山全集》第 2 卷，北京：中华书局。

民族编辑委员会，1986，《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肖子显撰，1972，《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

目 录

前 言	1
读王桐龄《中国民族史》	1
中国传统“族群观”与先秦文献“族”字使用浅析	35
“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与“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	64
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精英：理解中国从“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 进程的钥匙	74
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 ——回顾 1939 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	84
在革命背景下俄国和中国的“民族构建”路径	109
中国的民族问题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	122
现代国家观念的出现和国家形态的演进	145
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与“黄帝崇拜”的族群狭隘性	157
如何思考 21 世纪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	169
加紧创建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应对 21 世纪面临的严峻挑战	192
中国“族群”概念的探讨	221
试论语言社会学在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228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思考双语教育	247
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发展与双语教育	266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动西藏社会发展研究	293
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306
附录	
社会资本与少数民族发展	
——林南、马戎对谈	337
全球化、本土性与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访谈	354
学者的爱国情怀	373
关心少数民族企业家的成长	
——介绍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教授的新书《凉山彝族企业家》	377

读王桐龄《中国民族史》*

在鸦片战争及随后的几次与西方列强之间爆发的战争中，当年一度雄视东亚、以“天朝上邦”自居的大清帝国被证明是如此不堪一击。在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后，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和政治文化精英们必然要思索中国未来的出路，以应对“三千余年未有之一大变局”。承继了几千年的以中原皇朝为核心构建的“天下观”政治实体和以“华夏文明”对周边“蛮夷部落”施以“教化”的“文化中心主义”族群观的思维传统和政治格局，在“船坚炮利”的新兴欧洲帝国主义的冲击下已无法延续，中国人从此被迫接受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和外交游戏规则，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一条现代意义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之路。

当时列强从各个方向积极蚕食和瓜分这个虽然古老但日趋腐朽的东方帝国。也正是由于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晚清政府在这一紧迫态势下不得不在自己的有效管辖地域内加紧推行政治整合和人口重新布局，如通过开放对东北移民的限制和推行内蒙古牧区“放垦”来“移民实边”，又如赵尔丰在川边康区实施“改土归流”，联豫和张荫棠在西藏推行新政，以及西北新疆建省。在边疆各地不断遭到列强抢夺蚕食的紧迫形势下，清朝不得

* 本文初稿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125~135页，此为修订稿。

不从中华传统的“核心行省”向外行政管辖与控制逐层减弱的“内强外弱”的模式，逐步转变为优先加强最外环控制的新模式。

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们也开始接触发源自西方工业化进程的现代“民族”（nation）概念，并尝试把这一概念用于中国。“中国”或“中华”是不是一个“民族”？中国境内的汉、满、蒙、藏、回各部应当被视做各自不同的“民族”，还是属于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如果满蒙等群体被称为“民族”，那么中华是否应被称为“国族”？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动荡年代，这些都曾是人们反复讨论并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

辛亥革命后，清朝皇帝颁布诏书正式退位，把全部权力移交给新建立的中华民国。但列强（尤其是沙皇俄国、英国、日本）乘势对中国领土进行蚕食，鼓动边疆蒙藏等部首领提出独立诉求，支持各地军阀拥兵割据。这些都使新生的民国充满了变数，也使中国周边的局势变得极其复杂纷乱。中国如何在这样的乱局中构建一个“民族国家”，便成为当时社会精英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国情态势下，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把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起源、演变和相互关系的发展过程梳理出一个头绪，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和流行的话语体系中为中国努力建立一个新政治实体提供理论框架和合法性基础，便成为当时中国学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文化学社1934年出版了王桐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史》^①，同年世界书局出版了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民族史》，随后商务印书馆1939年又出版了林惠祥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在短短几年内连续出版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系统专著，说明当时中国人对于“中华”政治实体应当如何建构以及它的历史合法性的关注。

在阅读了这三部《中国民族史》之后，我觉得王桐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在思考中国“民族构建”的基本框架和分析思路方面是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这部著作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理念来解读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尝试。王桐龄先生（1878~1953）两度留学日本，191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是我国第一位在国外攻读史学并获正式学位的学者，归国后长期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由于他留学日本多年，洞察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及瓜

① 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初次出版于1928年，1934年为修订版，篇幅和内容均有大幅增加，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有影响的是1934年版。

分中国的狼子野心，回国后即着手撰写《中国民族史》，以反驳日本学者利用“民族”话语来肢解中国的种种谬论^①。该书原计划分为上下两编（“内延史”和“外延史”），分别叙述“中国民族对内融合事迹”和“中国民族对外发展事迹”。在20世纪90年代上海书店编印《民国丛书》中，王桐龄先生所著《中国民族史》的“内延史”部分与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民族史》（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同编入该丛书的第一编第80卷（历史、地理类）影印出版。而王先生的下编“外延史”在1934年后是否出版，则不得而知。

值得注意的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和林惠祥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在20世纪90年代曾先后出现了多种单行本，广为人知。与之相比，王桐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史》直至2010年才由吉林出版集团刊印发行单行本，所以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今天，当我们努力认识和理解20世纪初叶中国是如何努力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进程时，从这个观察和研究视角来看，我认为王桐龄先生1934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是一部极为重要的研究文献。阅读和理解这本书的核心概念和叙述思路，将有助于我们了解30年代“中国民族”研究中非常重要但被今天的人们长期忽视的一派观点。本文将主要介绍和讨论王桐龄《中国民族史》一书的内容和它的学术意义，同时，我们在讨论中也将参考吕思勉和林惠祥两位先生所著的另两本《中国民族史》，并努力把这三本书的特点进行比较，同时思考这三本书给我们今天中国的“民族”研究和族群关系研究能够带来怎样的启示。

一 关于中国各民族的起源与分类

由于20世纪30年代各种研究条件的限制，王桐龄先生当时无法全面了解世界各国的历史考古发现与后来中国各地考古新发现的各种研究成果，

^① 汉语中出现的“汉民族”“蒙古民族”“满洲民族”等词汇，大多出自日文汉字，“中国本部”抄自日本地理教科书（顾颉刚，1939），“（汉族）十八省”的提法最早见于日本的宗方小太郎在甲午战争时期为侵华日军第一军用中文所撰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告示（宗方小太郎，2010），而风行一时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狭隘汉人民族主义的口号，则出于日本黑龙会下属玄洋社给孙中山的建议。

因此这本书中关于人类各种群的起源，仍然借用了当时的流行说法，即认为人类在地球上的大洪水时期奔避于帕米尔高原，然后分道下山，分散进入世界各大洲并在各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内演化成为世界上目前的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各支。流行于 30 年代早期的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自然存在不少疑问。

与之相比，吕思勉认为汉族族源的由来尚难做定论，但可以经过参考“他国古史”和“发掘古物”来逐渐查明。林惠祥则从各种中西文研究文献中整理出有关中国民族族源的 11 种观点并加以评论，认为其中有两种观点值得关注，之一的“新西来说”根据对仰韶陶器与中亚陶器之比较，认为中华文化来源于新疆；之二的“土著说”则得到“北京人”考古发现的支持（林惠祥，1993a：57~62）。与王、吕两位相比，这些归纳和分析反映林惠祥先生对西方文献与考古成果的关注^①。

王桐龄先生认为黄色人种这一支，根据下山后各自选择的不同迁移方向而形成了南三系（苗族、汉族、藏族）和北三系（满族、蒙古族、回族）。这里的“苗族”涉及范围甚广，“历史家称之为交趾支那民族；现在四川南部之獠，贵州之苗，广西湖南之猺，云南之猺，广东之蛮，同暹罗越南境内之土人，皆属于此族。因中国唐虞时代，此族曾创立过大国与汉族对抗，国名三苗，所以后人就简称之为苗族”（王桐龄，1934：2）^②。而这里所说的“满族”，“历史家称之为通古斯族——Tungus——因为此族大多数住在满洲，所以现在就简称之为满族”（王桐龄，1934：3）^③。这里的“回族”，“历史家称之为突厥族——Turk——因为此族大多数奉回教，所以现在就简称之为回族”（王桐龄，1934：3）。民国初年人们常说的

① 费孝通先生于 1989 年发表的文章中，则基于 20 世纪 50 年代和 70 年代各地发现的猿人化石、新石器遗址等考古成果而否定了中华民族起源的一元论和外来说，肯定了多元论和本土说（费孝通，1989：2）。

② 吕思勉认为“今所谓苗，……或以附会古之三苗，误矣”（吕思勉，1996：5）。林惠祥也称“以前史家谓古之三苗即今之苗族，现代学者多否认之”（林惠祥，1993a：14）。费孝通教授也指出，“‘三苗’却还有人望名构史地和现在的苗族联系了起来。这固然是牵强的推测”（费孝通，1989：12）。

③ 据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考证，“Tungus，原来是 Yakut 人中突厥人因轻侮其邻民族而称者也，其义为豕之义焉。俄人于 17 世纪始闻之而传于欧洲，于是此名遂为亚洲北部所住之民族之总称也”（林惠祥，1993a：149）。

“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中的“回”，是包括了新疆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群的。王桐龄先生对于中国民族的“南三系”“北三系”之分类，与民国初年人们常说的“五族共和”的大框架基本上是相互吻合的，只是增加了一个南方的“苗族”^①。

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民族史》(1934)^②对于中国各民族的分支，提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历史至今，中国民族共分为12支：汉族、匈奴（五胡十六国后与汉族同化）、鲜卑（辽为金所灭后被同化）、丁令（亦称之为突厥、回纥，今之新疆诸民族）、貉族（朝鲜族）、肃慎（女真，今之满族）、羌族、藏族、苗族（南方诸族）、越族（今之马来人，旧时分布于东南各省之部分已被同化）^③、濮族（夔，今称猺罗、摆夷）^④、白种诸族（人数较少，分布于帕米尔高原以东）。吕思勉把白种人排除后的其他11支分为北派（匈奴、鲜卑、丁令、貉族、肃慎）、南派（羌、藏、苗、越、濮）和中派（汉族）（吕思勉，1996：1~6），而对蒙古族的历史变迁，则在“肃慎”篇中予以叙述^⑤。在这11支中，除了在中国境内已经被同化的古代匈

① 这与当时多数学者的观点相一致，在林惠祥归纳的不同学者对于中国民族的13种分类方法中，梁启超分为“中华族、蒙古族、突厥族、东胡族、氐羌族、蛮越族”（大致等同于汉、蒙、回、满、藏、苗），章诤分为“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苗族”，张其昀分为“华夏族、东胡族、突厥族、蒙古族、西藏族、苗蛮族”，宋文炳分为“诸夏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回族、藏族、苗族”，赖希如分为“中华族、匈奴族、东胡族、突厥族、蒙古族、西藏族、南蛮”，等等（参见林惠祥，1993a：2~6）。

② 这本书于1996年由东方出版社编入“学术经典”系列出版了简体横排版，本文引用的页数均出自这本简体横排版。

③ 在第一章总论中的“越族”，在后面第九章中均改为“粤族”。林惠祥引用林语堂观点认为“越即粤字，……古‘粤’‘越’两字相通”（林惠祥，1993a：111）。

④ 林惠祥则把“罗罗”列入“罗罗缅甸系”，而把“摆夷”归入“夔掸系”（濮）（林惠祥，1993b：281）。

⑤ “1114年，而此族之黑水部曰女真者兴起。……十有二年而灭辽；又二年而亡北宋，奄有中国之半。凡百二十年，而亡于元。其居长白山者，后四百年乃兴，是为清。其居黑龙江上游者为室韦。其别部，唐时曰蒙兀，即后来之蒙古。”（吕思勉，1996：4）按这一思路，元灭金似乎是肃慎的两支后裔相互残杀，依吕思勉之见，渤海、女真、室韦、蒙古、满洲，均为肃慎之支系。“蒙古出于室韦”“亦女真同族”（吕思勉，1996：181）。但他亦指出“蒙古部族，据予所考，实靺鞨、室韦之混种；而靺鞨又为靺鞨及沙陀突厥之混种”（吕思勉，1996：183），如果是这样复杂的血缘关系，把蒙古归类于肃慎是否恰当，似仍可斟酌。

林惠祥认为“室韦，……亦肃慎族之一支，……其中一部唐时名蒙兀室韦者后与靺鞨族混合而成为蒙古族之皇室”（林惠祥，1993a：188），他据此把蒙古列为古代民族中单独一系。

奴、鲜卑、越族三部分之外，保留至今的为汉族、回族（包括新疆各族）、貉族（朝鲜族）、肃慎（满族，包括蒙古族）、羌族、藏族、苗族、濮族（彝族等）共为8族。这本书在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各民族进行分类时，已经考虑到了“跨境民族”这个现象（朝鲜族、越族、白种族群），这一点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是值得关注的。但是对于蒙古族是否应属于满族支系的提法，尚有可以讨论的余地。

林惠祥先生于1939年出版了另一部《中国民族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出版，1993年该出版社再印影印本），明确提出民族史研究应当涉及的内容，即讨论各族“其种族起源，名称沿革，支派区分，势力涨落，文化变迁，并及各族相互间之接触混合等问题”（林惠祥，1993a：序2），并在这本书中试图系统和全面地分析各族群的演变历史，这反映林先生所受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影响。

林惠祥概括介绍了各种文献中提出的对于中国民族的13种分类方法（林惠祥，1993a：2~6），认为因古代民族的称呼不同于今日民族，而今日民族乃由古代民族演变融合而来，所以应当有“历史上的分类”和“现代的分类”两种，并用一张图来表示历史上各“系”与现代各“族”之间的演变关系（图1）。他把中国古代族群区分为16“系”（华夏系、东夷系、荆吴系、百越系、东胡系、肃慎系、匈奴系、突厥系、蒙古系、氐羌系、藏系、苗瑶系、罗罗缅甸系、僂掸系、白种、黑种^①），把现代族群区分为8“族”（汉族、满族、回族、蒙古族、藏族、苗瑶族、罗缅甸族即彝族等^②、僂掸族即白族傣族^③），历史上各“系”与今天各“族”之间用线联系起来，实线表示进化融合之主要渊源，虚线表示次要关系（林惠祥，1993a：9）。

林先生的这本书认为汉族主要来源于四个系统（华夏系、东夷系、荆

① 林惠祥认为“按张星烺氏考得昆仑奴即非洲黑奴，证据甚确凿，绝无疑义”（林惠祥，1993b：335）。据此认为黑种人应列为中国民族来源支系之一。

② 该系包括了罗罗（彝族）、栗粟（傈僳族）、罗婺（拉祜族）、窝泥（哈尼族）、阿昌（阿昌族）等族群（林惠祥，1993b：250~258）。

③ “僂掸系即所谓泰掸族，……此族散布之地颇广，占暹罗全部、缅甸东部、安南西部及中国西南部，纬度25度之南。名称随地而异。”（林惠祥，1993b：262）“南诏……为僂掸所建最大之国。”（林惠祥，1993b：275）